

地方党史漫谈

旅途发现

## 桑植起义简述

□戴楚洲

割据湘鄂边是党中央组织农民武装暴动计划的组成部分，举行桑植起义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28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湘西北特委，并派贺龙和周逸群回湘西，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为郭亮（后改由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1月中旬，周逸群、贺龙、卢冬生等在周恩来安排下，从上海抵达武汉，转战荆江两岸。2月28日，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卢冬生等8人经过慈利县的江垭到达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进行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筹集军费粮饷等各项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3月，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和贺龙等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补充贺锦斋和李良耀进入湘西北特委，并对开展工作进行分工；组建中共桑植县第一届委员会，李良耀任书记。

湘西北特委首先抓住的，是解决贺氏家族及其亲属统一思想认识的问题。贺龙、周逸群首先找贺英谈话，贺英表示：我把武装队伍和枪弹交给你们，交给共产党。就算我第一次献给党的一批礼物吧。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握住贺英的双手感慨地说：贺大姐，你的这份见面礼好极了！共产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珍贵的礼物。

中共湘西北特委抓的另一工作，是以贺龙的名义联络旧部知交和地方武装，组建革命武装。贺英、贺满姑、贺斌姑、贺桂如、贺连元、贺炳南、贺沛卿、贺文渊、刘玉阶等贺龙亲族率先把他们带的1500多人的队伍，连同800余支枪交给中共湘西北特委，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来源。在贺英带动下，贺龙旧部的王炳南、李云卿、文南甫、王湘泉、钟慎吾、谷佑箴以及农民自卫队谷志龙、藤树云、刘子维等部地方武装也都献出自各的人和枪，共同参加工农革命军。中共湘西北特委以贺英、贺满姑、贺连元、贺文渊、刘玉阶等交给党的武装人员1500人组成核心队伍，使其成为军队的基本队伍，习惯上称为“基本队”。听说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党，穿着布鞋、草鞋或者赤着脚板，肩扛铁枪、火铳，手执梭镖、大刀或者拖着锄头、棍棒的庄稼汉们足有千人，聚居在洪家关。经过一个多月宣传发动，贺龙收编家族武装、地方武装，拥有3700多人、1500余支枪。工农革命军的创建，为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建立联合战线的实践方式提供典范。中共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采取拉关系、策略，区别不同情况，对各种地方势力采取不同对策。贺龙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利用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在桑植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采取改编方法，把农民武装和家族武装的力量吸纳到军队中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上独特的对地方武装改造的成功范例，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改造地方武装进行有效尝试，积累宝贵经验。

3月30日，中共湘西北特委在洪家关召开十余支武装负责人会议，打出戴桂香用红布缝制的湘鄂边第一面军旗。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并将各部统一编队。工农革命军下辖一个师、二个团、四个大队。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贺桂如、李云卿分别担任团长，贺炳南、王炳南、刘玉阶、文南甫分任大队长。

4月2日清晨，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正式举行桑植起义。3700名官兵分三路蜂拥着朝桑植县城冲去。贺龙、贺桂如率中路军经文家垭、蔡家峪过八斗溪直插县城北门，贺英随中路军攻城；贺锦斋率左路军走岩岗塔越风垭穿柏家冲杀向东门；李云卿率右路军绕南岔，跨澧水，奔汪家坪冲向西门。上午11时左右，向桑植县城发起总攻，打败县城团防陈策勋所部，歼灭张东轩等部武装，攻占桑植县城。4月2日，中共桑植县第一届委员会随即迁入桑植县城办公（中共桑植县委旧址位于桑植县东正街）。中共桑植县委的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得到加强。4月3日，中共湘西北特委在县城举行庆祝大会，首次成立第一届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活动，张贴《工农革命军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革命军的宗旨。

桑植起义的胜利和桑植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拉开湘鄂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序幕。桑植起义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鄂边的统治，掀起了湘鄂边的革命风暴，为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奠定坚实的基础。桑植起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方式最独特、道路最曲折和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起义。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桑植起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旧式的农民武装，采取聚义的方式建立武装，然后在同敌人的斗争中，逐步改造自己，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利用地方武装形式的武装起义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少有的，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实践。

桑植起义以后，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率部转战湘鄂边境。4月中旬，国民党黔军第43军第3师第5旅龙毓仁旅会同国民党独立19师陈渠珍所部向凤翔、姜文周的两个团，在桑鹤联防剿共指挥陈策勋带领下，进攻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由于工农革命军刚刚组建，缺乏武器，未经训练，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面对强敌进攻，尽管工农革命军顽强抵抗，但是梨树垭、双溪桥两战失利，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相继失守。工农革命军被迫撤退至桑植县内半县桥自弯、凉水口、沙塔坪、白果垭和白龙泉等地的崇山峻岭之中。

4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离开部队以前，对贺英说：你原来带的这些姐姐、妹妹、外甥侄，过去都是你管的，还是归你管吧。为了让贺龙无牵无挂地打仗，贺英姐妹重新带起队伍。贺龙军长把留守后方桑植的任务交给大姐贺英和大妹贺满姑之时，工农革命军拨给一些枪支弹药，委托她们组建“桑植县留守游击队”。贺英担任桑植县留守游击队司令，贺满姑担任留守游击队妇女队长。

4月下旬，贺英等人躲到鹤峰县红土坪田少梦家里。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受挫后，贺龙、卢冬生、李良耀、张一鸣、王炳南等负责人转移到红土坪等处休整。黔军龙毓仁旅于5月追到苦竹坪，工农革命军与敌激战到天黑，贺锦斋师长率部突围，溃散以后撤到红土坪。大家在田少梦家里召开会议，总结军事失利的教训，决定主要负责人员分头活动。贺锦斋、王炳南等人回到桑植县收集失散队伍，李良耀前去鹤峰县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贺英和谷德桃负责安置伤员和军人家属，贺龙、卢冬生等人到鹤峰县走马坪、慈利县官地坪利用朋友关系筹集枪弹粮饷等军需物资。李良耀在鹤峰县城与徐锡如领导的鹤峰县党组织接上关系，接着徐锡如和李良耀一道赶到红土坪向贺龙汇报党组织在鹤峰县工作情况。

贺龙等人从鹤峰县走马坪和慈利县官地坪带来一批银元以后，率部转移到龙潭坪和茅垭等地。6月上旬，工农革命军在红土坪等地集合400多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6月下旬，获悉黔军龙毓仁旅后李孝渊輶重连离开桑植县城，往龙山县西撤。贺龙的几个部下向贺龙请战，贺锦斋说：在桑植县小埠头的葫芦壳打埋伏。贺龙点点头说：对嘛。6月25日，贺龙等人埋伏在小埠头的葫芦壳。敌人听着土家农人的山歌，走进贺龙等人埋伏的伏击圈。上午11点，贺锦斋等人一个冲锋，在小埠头的葫芦壳全歼这个輶重连。歼灭150多人，缴获枪支120多支、子弹数千发，获得一批军用物资。贺桂如参加葫芦壳埋伏，在农民帮助下，活捉敌军旅参谋长张贺。小埠头战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打败国民党正规军，部队士气为之大振。6月29日，贺龙、贺锦斋等人率部直闯樵子湾伪区公所，处决叛徒、伪区长张善卿。趁胜重新占领洪家关以后，贺龙部属贺桂如、文南甫等部归来，致使工农革命军恢复到1500余人。

兔年大年初一，我正在长沙享受与家人团聚、含饴弄孙的快乐，流云先生兴冲冲地从张家界打来电话，除了拜年，就是告诉我，他将于3月1日在长沙组织的“张家界之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会暨“流云有约”湖湘文化旅游大讲堂启动仪式，已经得到了谢资清、叶文智、曹泽云、鲁明勇等业界名流的支持，并已得到了市内相关领导和单位的支持。我说，我对你的活动也是支持的，对一切有利于张家界营销策划活动都是支持的。我们说着说着，不知怎么说到“墙内开花墙外香”，张家界旅游的发展要留住住人才这些话。我有感而发，随口说道：张家界旅游需要人才，也容得下人才，我们需要一百个流云，也容得下一百个流云。没想到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流云，流云当天就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宣传了我的话，并私信我，希望我以“张家界需要一百个流云”为题，为他3月1日的活动再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

我说“张家界需要一百个流云”，是随口说出，但不是信口开河。流云其实叫刘云，出生于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办事处田家坊村，是实实在在的张家界本土人士，流云是其笔名。流云一岁丧母，少时家贫，因命运坎坷曾在永定区合作桥乡、罗水乡、三岔乡等地四处漂泊而饱尝生活艰辛，高中只读了一年就被迫中止了学业。就是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一辈子却嗜书如命，与书结缘甚深。从年轻时开书店谋生，到中年以书为媒，结交天下豪杰，渐老之后，自编自写，书行天下，一个高中肄业生，还真的就“著作等身”了。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曾为其赠言，是“苦难造就一个人的精神魅力，是苦难造就一个地域的文化品格”。我在省旅游局工作时，即认识流云，知道他组织过张家界导游万里行等活动，编过

张家界一些宣传资料，是一个特别勤奋、为宣传张家界舍得拼命的人。到张家界工作后，我在市政府工作，流云是市文旅局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行政角度来说，我们隔着一些层次，但流云要找我时，总有他充足的理由，我们交往颇多。后来，我支持市文旅局搞了个旅游智库研究院，因行政人员不能任职，流云就成了理事长的最佳人选。去年，流云快退休时突然来找我，一是对旅游智库研究院有些留恋，表达了对其前途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些茫然。我说：你对旅游智库研究院前途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要按规定和程序办；至于你退休之后的事情，我敢肯定地预测，那会很精彩”。因为，在张家界旅游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你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泛的人脉资源，再加上你勤学善思，出了那么多书，有了那么多案例，你流云本身就已经是个品牌，完全可以打响。我流云也是品牌吗？流云似乎还有些不太自信。那当然，流云是依托张家界这个大品牌成长起来的，张家界名震中外，流云也完全可以名闻遐迩。我进一步鼓励他。果然，退休之后，流云放开了手脚，从退休到现在，出了好几本书，组织了好几个营销活动，都非常成功。流云从这些成功中找到了方向，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信。流云是市政协老委员，作为一个年过六旬的退休之人，他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他退休后，我应邀去过他家一次，为他题了“天门洞开，流云吉祥”几个字，意思是只要流云象天门洞那样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为张家界的发展鼓与呼，晚年一定是幸福而又吉祥的。我的这几个字，流云自然喜欢。我说张家界需要一百个流云，一百“是不定指词，实则是说，从旅游营销的角度来讲，像流云这样不以年长而避世，不以位卑而忘言，不以学浅而畏

写，不以力弱而慎行的思想者、执行者、开拓者，在张家界是越多越好。岂止是一百个“流云”，一千个、一万个“流云”我们都需要。

需要”是一种愿望，“容得下”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人才环境。我说“张家界容得下一百个流云”，是针对张家界的过去而言，也是针对张家界的现在和未来而言。张家界有绝版的旅游资源，1988年才建市，34年来，张家界一直以负重者、开拓者、勇毅者、追赶者的姿态在前行，执政者从来没有忘记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旅游人才的重要性。从叶文智的飞越天门到孙宝贵的百龙天梯，从张同生的翼装飞行到陈志冬的玻璃桥奇迹，从赵文星的七星山“天空之城”到茅岩河的“心湖”、杨继勇的冰雪世界、姜君的七十二奇楼、罗长江的《大地》、山水组合的《你莫走》等等，是张家界的“三千奇峰、八百秀水”为那些怀揣奇妙思想的“天才”们抑或是“疯子”们提供了广阔而奇特的想象空间。如果有人说张家界这块土地出不了人才、容不下人才，我是不赞同的。去年，我支持市文旅局出版的《中国旅游营销张家界范本》，便是张家界三十多年风起云涌的旅游营销史的一个小结，更是各路“英雄豪杰”在张家界大展拳脚的一个缩影。我长期从事旅游工作，在张家界工作也已七年多，见证了许多奇迹的产生。作为执政者中的一员，我深知张家界高层对人才、尤其是旅游人才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尊重。就说流云吧，流云有流云的许多优点，但流云个性中那种因童年时受欺负太多而养成的过度“自尊”，流云有时不分场合的“大胆直言”和“执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可从书记到市长，张家界的许多领导都是流云的好朋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容”，就是张家界有容纳人才之量。人才是生产力第一

要素，得人才者得天下。三十多年的追赶，已经让张家界由“养在深闺人未识”，成为了今天中国旅游的标杆，湖南旅游的龙头。特别是去年，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成功举办，再一次为张家界奠定了湖南旅游的“霸主”地位。未来的张家界，其奋斗目标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张家界深知过去的追赶，引才、聚才起了关键的作用；也深知未来的比拼，更需要引才、聚才。张家界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告：我们需要流云，需要一百个流云，也容得下一百个流云。一百个流云会有一百个流云的奇思妙想与鲜明个性，一百个流云会有一百个流云的“独门武功”与雄才大略，张家界有能力、有信心容纳他们、关心他们、支持他们，为每一个流云提供能够充分发挥和展示其才华的舞台。

三年疫情，中国旅游的许多格局和规则都在发生改变，但“人才兴旅”方略不会变。随着国家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张家界已宣布今年为“旅游全面复苏年”。流云组织的“张家界之春”活动恰逢其时。希望这个活动，是一次湖南文旅深度融合的探讨会，是一次为张家界旅游全面复苏鼓劲加油的“诸葛亮会”，也是一次为张家界招贤聚才的“群英会”。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期待着流云先生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张家界旅游营销作出更大的贡献；也期待着更多的“流云先生”，涌入张家界、扎根张家界、痴迷“张家界”、营销张家界，来共同托起张家界旅游辉煌的明天，托起湖南旅游、中国旅游辉煌的明天。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春天，不会辜负每一个热爱者、执着者、奉献者。”

写于2023年1月23日



雪树银花 林廖君 摄



茶馆品茗

## 烹茶定汤

□江舟

古人饮茶的方式，与今日常见的沸水冲泡完全迥异。

最初，茶叶是自采自摘，生煮羹饮。到唐代，为了携带、运输的方便，发明了用蒸青法制作团饼型茶，一直沿袭到宋代。唐宋两朝，饮茶之风鼎盛，烹茶，亦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唐人把烹茶过程艺术化，对取火、定汤有很多的讲究，并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这种烹茶定汤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选茶、择水之乐。

陆羽在《茶经》中把“煮”视为“九难”之一，蔡君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候汤最难”。所谓候汤，指的是火候与定汤。火候即烹茶的火力；定汤便是把握煮茶的水温。水要讲究用活水，火也讲究用活火，苏东坡说：“活火还须活火烹”。所谓“活火”，即有焰之炭火。许次纾《茶疏》上这样说：“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余烟，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有焰之炭，火力旺炽，又不会使茶汤染上烟火之味，故为上品。

至于定汤，那就更为讲究。陆羽《茶经》把煮水分三个阶段：水面泛起鱼目气泡，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清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煮水时应凝神静心守候，听到“松声”时去盖，以正当三沸的水为佳。三沸过后，旋即无声，则汤老香散不堪用。

苏东坡的《试院煎茶》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飏飏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蟹眼”是指初沸时的小气泡，鱼眼则是指继而出现的稍大的气

泡，此时水沸声如松风轻鸣。苏东坡认为这种尚未鼎沸的水烹茶为最佳。

古代文人重视火候定汤，并非将此作为一种技艺，而更多地是把它作为品茶的有机组成部分。林语堂说：“一个人只有在神清气爽，心平气静，知己满前的境地里，方能真领略到茶的滋味。”

起火升炉，细烟袅袅。松竹之枝，燃之毕剥，或一人独处，缓烹慢煎，细品悠啜；或邀二三知己，围坐炉前，就着沸水、茶沫、汤花、汤色品评清谈，吟诗酬唱，其中韵味，又何得言传！烹茶的过程，本身便充满雅趣，火候定汤，更是渲染气氛酝酿情绪的极佳方式。

元代洪希文有《浣溪沙》一首：“独坐书斋日正中，平生三昧试茶功，只看水火自争雄。势挟怒涛翻急雪，韵胜甘露透香风，晚凉月色照孤松。”元代马臻也有《竹窗》一首：“竹窗西日晚来明，桂子香中鹤梦清。侍立小童闲不动，萧萧石鼎煮茶声。”

诗人描绘的这一幅幅烹茶图，生动而令人神往。无论独坐书斋还是与朋友共饮，面对炉灶活火，倾听如松风之水声，观如鱼目、滚珠之沸水，见如枣花、青萍、浮云之汤花，未及品尝，已忘却凡尘，渐入佳境。传说蔡君谟年迈，不能饮茶，每天还必亲自烹茶自娱，他对烹茶已从乐趣而转为癖好了。

南宋时候，炒青制茶发明，然而烹茶之风仍然盛行。直到明朝以后，文人才逐渐由“烹茶”转变为“泡茶”，虽然方便，但烹茶过程的乐趣也损失了不少。文人们只得把更多的趣味，投向茶、水乃至茶器了。

平凡人生

## 慢是一种人生智慧

□刘芳毓

接一碗水，如何最快？是急于求成将水龙头开到最大，还是静心等待流得并不快的水流慢慢盛满？经验告诉我们，后者更佳。即使过着快节奏的生活，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依旧会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慢也是一种智慧。

慢是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

慢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寂静，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悠闲，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自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把时间填满，不知不觉中自在的自我被挤出我们的生活。相反，慢生活中的节奏被放慢，我们拥有更多时间与自己对话，可以放慢步调，静待花开。如果把都市生活比作一首编排紧凑的交响乐，那慢生活则是一曲牧童随意哼唱的小调。快与慢有时只是一纱之隔，当我们在浮华的生活中真正做到心有所念，不慌不忙，在心里为自己唱一首牧童小曲，何尝不算是一种慢生活呢？

慢是一种静水深流的人生态度。

往往平静的水面下有着不可测量的水深，看似慢慢悠悠的人往往拥有大智慧。这种慢意味着不骄不躁、稳重成熟。中国传统艺术书法注重稳重，笔划与笔划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平衡，唯有在心中怀有一种慢的平衡，写出来的字迹才会苍劲有力。那些看似慢慢的背后是一个人的稳重的姿态。沉下心来，不要让焦躁占了上风，在繁杂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节奏，慢下来，更从容。

慢是一种行稳致远的事处观念。

欲速则不达，龟兔赛跑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慢慢走反而更快达到目标。这种慢不是懒散，不是拖沓，而是懂得怎样脚踏实地，事半功倍。朱熹在读书方法上特别讲究“循序而渐进”，在熟读之后要有认真的思考，这样一来，自能下笔有神。反观曹操，他渴望统一全国，在攻下荆州后急于求成，最终被孙刘联军火烧赤壁，溃败。由此可见，无论是读书之小事，还是统一之大业，都应循序渐进，倘若只顾拔苗助长，最终只会一事无成。与其一味追求速度，倒不如将每一步都做到极致，就算慢慢，也会有所收获。

慢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智慧。放慢步调不意味着停止奔跑，放慢节奏不意味着乐曲终止。被快生活包围着的你我常常会忘记慢的智慧。其实有时，慢慢来，比较快。